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从井冈山一路转战,最后在江西瑞金这块风水宝地上落地生根,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代共产党人在瑞金群英聚首,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进行了一场伟大预演,奠定了瑞金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瑞金人因豪相相传,习惯于此段引以自豪的红色历史称之为“头届红”。

二〇〇九年,中央电视台隆重开拍三十集电视剧《共和国摇篮》,向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六月七日,剧组赴瑞金拍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历史场景,需要招聘一批群众演员,我得以借助蒙太奇穿越时光隧道,亲身体验了一番风云激荡的“头届红”。

这天一大早,我们在叶坪村革命旧址群前集中。早餐后,工作人员发给我一件又脏又破的布扣偏襟衫和一条又宽又长的“斗笠鞋”,让我饰演一个工农干部代表。穿戴打扮妥当,我们陆续带进了谢氏宗祠熟

岁月游虹

悉环境。只见祠堂上厅搭了一个主席台,正面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巨幅画像和一面镶嵌着镰刀铁锤的红旗。两侧台柱子上张贴着一副对联,左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右联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横批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席台前铺满了松柏、鲜花和两条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的横幅布条。厅堂上下井然有序地摆着一排排几十排小木凳,左右两边各有用屏风分隔开的七八间小厢房,这就是当时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办公室,难怪有人戏称谢氏宗祠“一个祠堂装下了一个国务院”。

约九时许,随着一阵铃响,金韬总导演下令全体演职人员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一个女化妆师匆匆走过来往我脸上抹了厚厚的一坨油彩,并安排我跟一个器宇颇为轩昂的男演员同凳就座。我好奇地向他演什么角色,他说是毛泽覃。我不禁肃然起敬,连连向他打躬作揖、点头哈腰:“荣幸,荣幸!”他眉头一皱,欲言又止。这时,金导演在我旁边高声

亲历“头届红”

王卫斌

喊道:“李坚贞,李坚贞,你来这个位置!”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红军干部应声而至,就坐在离我不远的过道上。我忍不住左顾右盼,斜着眼睛偷偷地打量她,嘴里对她赞叹不绝。

“毛泽覃”见此情景,厉声批评我不能老是这个样子,要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我一愣,群众演员而已。他说来这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代表的是一个苏区干部的形象!我闻言大惭,赶紧收敛起眼角的余光 and 藏在偏襟衫、斗笠鞋下的“小”来,学他的样子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又是一阵铃响,饰演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和任弼时等首长的演员闪亮登场,在主席台上一一落座。金导演在台下不时地指挥他们:“老毛,你跟朱老总靠近一点!”“王稼祥,你的身子不要后仰!”“对对对,ok!”一切准备就绪,“项英”首先致开幕词,然后“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话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可他在聚光灯下一连宣布了好几遍,金导演都不满意,直热得他额头

不由得想起了古代那首名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别看演员们在荧屏上光彩照人,魅力四射,原来他们跟农民种田一样,都不容易啊。

中途休场,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杨新贵以及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胡恩、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东等有等领导来到拍摄现场,亲切慰问剧组全体演职人员。金导演代表剧组致谢,他动情地说:跟当年革命先辈们相比,我们这点苦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今天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从容地拍戏,天上没有敌机空袭,地上没有追兵围剿,饿了有营养大餐吃,渴了有矿泉水喝,付出了劳动给片酬,饮水思源,忆苦思甜,我们真是托了毛主席、共产党的福啊!

金导演一席极富鼓动性、感染力的话,引起了在场每一位演职人员强烈的共鸣,谢氏宗祠里顿时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港湾

曹伟达作

南游杂咏

李一

辛卯四月,与杂志社同仁偕游大洋洲。燕京方暮春,新澳已入深秋,时差无几而换世之感殊深。花草树木颇见生意,相看欣然,细察则多不习,寰球南北之异,此亦一微也。历十余日而返,匆遽间得绝句数首,用志行旅之思。

飞至大洋洲

朝沐春晴夕赏秋,日行万里见洋洲。白云红叶如相待,飒飒金风一洗忧。

新西兰北岛

北岛秋深雨细柔,红黄落叶岸边舟。轻风偏爱南来客,吹动云帆自在游。

新西兰南岛

天旷人稀岛自幽,茫茫草野逸羊牛。断崖峰顶千年雪,入峡湍流去不留。

皇后镇

小镇天凉正好秋,空山雨后乱飞鸥。

潺溪卧听泉声静,霞蔚云蒸雾满楼。

瓦尔提波湖

难得浮生生意悠,湖光潋滟豁吟眸。菜分波影琉璃碎,不碍鸥群戏水浮。

悉尼邦迪海滩

云卷云舒碧海天,风吹浪起白鸥旋。滩平沙细踏歌去,暮汐生时落日圆。

晨起海边观鹤鹑

岸际朝花缀露珠,海中海藻绕秋芦。鹤鹑缓缓滩边过,觅客张喉振羽呼。

维特港木桥遇雨

古木长桥步信行,忽来扑面袭衣声。欲将景色雨中赏,日出云开早放晴。

袋鼠岛神奇岩石

态异形奇各不同,似龟似虎似顽童。何时举架来砂面,映得天籁海水红。

很多人对非洲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恐怕就是肆意蔓延的各种怪异的热带疾病和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黄热、霍乱等疾病通过提前打预防针是可以预防的,而疟疾这种顽症是没有任何可以提前预防的有效措施来控制的。疟疾,俗称“打摆子”,是通过非洲的蚊子进行传播的,蚊子带有疟原虫这种病毒,而非洲的蚊子几乎无孔不入、难以防范,只要人的身体被蚊子叮咬过,体内就会传染上疟原虫这种病菌,一旦身体不适、感冒、发烧、体温上升,疟原虫就会成百上千地在人体内迅速繁殖,而导致体温忽高忽低、出汗、发抖、头晕、乏力,症状与发烧接近。

疟疾感染程度分为三类:轻

温39.6度,低压五十,高压六十,当同事开车数小时把我送到一所白人开的私立医院时,我已经头晕目眩站不起来了。护士推来一辆轮椅,几位同事把我挪到轮椅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或者说晕到几乎失去知觉,等我有知觉和较为清醒的意识后,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病床上打点滴了。

白人的医院就是看着干净、舒服,我住在一间双人病房,配有独立的卫生间。但是我的血压太低,不能站立,更别说行走了,所以我的“问题”只能在床上解决。病床离卫生间只有一米之隔,一开始我本以为自己可以快速落地走到卫生间,但从床上站起脚步刚一迈出去,就眼冒

在加纳打摆子

包宁

度、中度、重度。一般情况下感染了轻度疟疾也万万不能忽视,须及时治疗,或吃奎宁(比较伤肝)、青蒿素,或到医院、诊所打点滴。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或本身体质弱、抵抗力差,疟原虫繁殖蔓延到大脑,俗称脑疟,也就是重度疟疾,那么可想而知,人就彻底没救了。

几乎在加纳生活三个月以上的人都曾经患过不同程度的疟疾。我们工作组的同事还根据经验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戏称将疟疾总结成以下几种:见面摆、定时摆、告别摆。有的人刚来非洲,没有体会到也没有重视蚊子的危害性,很快就被蚊子侵犯了,加之对环境气候不适应,患感冒而导致轻度疟疾,这种情形被戏称为“见面摆”,即初次到非洲初次见到新同事而“礼节”性地打摆子。而“告别摆”与之同理,即在非洲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种种原因要离开非洲,心情复杂矛盾,而恰在此时,由于工作长期强度大、压力大,身体扛不住终于倒下,也就是在告别非洲告别战友时“礼节”性地打摆子。“定时摆”更有意思。我们有个同事,每天上午十一到十二点钟就开始头疼、打喷嚏、体温上升,症状和疟疾颇像,于是他逢人就说自己每天定时打摆子,渐渐就被大家简化说成“定时摆”了。

其实,一旦真的患了疟疾,那种滋味和感觉异常痛苦。在我到加纳生活工作的第六个月时我便被疟疾打倒了。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我几乎每天或每隔一天都要乘车三小时到阿克瓦打摆子,并当天返回驻地,天气炎热,旅途颠簸,日复一日,我终于在一个周日的下午病倒了。体

金星头重脚轻地摔倒在地而再一次失去知觉了。等我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就听见同事说,你该减肥了,我们两个人都没能打动你,又叫了一个护士来,我们都使出吃奶的劲了,连拉带拽地才把你抬到床上,以后你就在床上大小便吧。虽然我极不情愿,但出于无奈,只好这样了。

我在医院呆了一星期,打针、输液、吃药、量体温……病情终于得以控制,并逐渐有了好转。经参处和我们工作组都派代表到医院看望过我。我也暗暗窃喜,打摆子打真是时候,我终于可以有理由放一个长假了。也正是由于这一次的摆子,让我不久被单位调回了北京。所以我打的这次摆子也的确可以称作“告别摆”了。

真正因为打摆子告别人世的是我们工作组的一位来自湖南的中年工程师。那时我刚到加纳一个多月,就赶上这位工程师打摆子,从轻度转成重度,从中医转到西医,从白人私立医院转到加纳最大的国家级医院,几经周折,还是没能挽救他的性命。脑疟、脑出血、肝衰竭等等一系列死亡诊断,让工作组的所有人和当地华人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和悲痛中。葬礼按照当地人的习俗在国家公墓举行,工程师的遗体安放在木制的棺材里,被架在一块平地上。仪式开始后,所有人有秩序地依次向遗体鞠躬告别并绕遗体一周。此时,在悲痛之余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工作组雇用的几十名当地工人,他们也自发地赶来为中国工程师送行,并在现场动情地唱起了灵歌,歌声婉转哀怨悠远。仪式结束后,遗体连同棺材一起被露天火化,天空被染成了鲜红色,工程师的骨灰最终由同事带回了国内,送到亲人身边。

这段经历是痛苦的,令人难忘的,每每想起心里都会丝丝泛酸。这就是非洲,这就是加纳,让人又恨又爱的土地。



凭海临风

拾麦穗的女人

陈奕纯

大雪时刻,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法国画家米勒的那幅名作《拾穗者》,那个在辽阔的大地上拾麦穗的年轻女人,她小心翼翼地捡拾着麦田里许多遗留的麦穗,脸上虽然荡漾起无限的喜悦,但依然抵挡不了她内心巨大的孤独和寒冷。

路得,这个可怜的悲剧女子,这个从伯利恒迁居到摩押的以利米勒家的年轻寡妇,凄情弥漫大地,她正站在以色列的麦田中央,捡拾着遗落在大地上的最后一根麦穗。

也不知这大雪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

花城下雪,百年一遇,听说是明、清一朝一雪,其余气温都是在零度以上,偏偏这思维就在二〇〇八年初被修改了。雪越大,没完没了了起来,二十八层楼的室内出奇的冷,平日里是没有暖气、火炕、电热毯之类的,空调里吹的也都是冷气,可偏偏说下雪就下雪了,南方人哪受得了这等洋罪?我凭窗远眺,乳白色的花城、乳白色的珠江起伏起伏,绵延数百里,大美,直铺向天边。

空气中潮湿的,潮湿和寒冷纠缠一处,入木,入骨。城市之上,登高者不止我一个人,我想我们是孤独的,登得越高,越是孤独。不可否认的是,长时间的孤独感迫使我无法呼吸,拼命在书画艺术的暗道里奔跑,不停地奔跑。后来的后来,把我的名字跑丢了,把我的生活跑丢了,世界只剩下了黑和白,或者是停停走走。时间就是在这种恍惚惚中过去了,我把一个男人的名字弄丢了,我不知道我是谁了,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乃至有一天晚上,我怀揣着一大

灯下漫笔

诗人的勋章

王妍丁

这是一个节日 一个由苦渐渐变得芬芳起来的节日 灵魂沾满新鲜的草叶和艾香 眼睛可以那样的明亮 也可以像大地和江河那样 沉入无尽的思索

日子竟然站得那么端庄 即使冷风割伤骨头 也不顾影自怜 即使内心只剩下一棵草的寂寞 也要大声疾呼羊群和洁白 呼唤星河和太阳

一些汉字注定要被凿成石头 一些石头注定要开成花朵 一个节日 它留下很多成长基因 也告诉人们许多关于春天的隐秘 一个懂得该怎样开花的人

一个节日 它的温暖与活着和怎样活着有关 最硬的骨头 往往就是一种真理 我的叹息里没有哀伤 我知道艾香 露水和祖国 这些终将成 诗人的勋章

端午节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节日,也是我的节日;端午节更是那位佩戴着兰草跳入汨罗江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日——端午节注定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日。

听说,那个端午节,白白的羊群上山了,坡上开着红红的山丹花,像是打着小红灯笼,迎接你的落草。从此那个诗意的日子,年年就成了我诗意的生日。儿时总是傻子似的盼过生日,似乎不知道人过一个生日,生命就是少了一岁的。记得那一个端午节,我总要到山坡上去采艾蒿。把艾蒿插在门楣上,再顺便插一枝山丹花,那诗意就愈发浓烈起来;山里人家门上插艾蒿的,不管插艾蒿是不是真能辟邪,但那肯定是一道诗意的风景。如今那艾蒿的香味,仿佛还在我眼前弥漫。

父亲摘回来一葫芦桑葚,紫的、红的、白的,那就是给我的香甜的、回味无穷的生日礼物了。母亲准会给我煮几个鸡蛋,往往还要把鸡蛋染红;那山丹花蕊是上好的红色染料,把它抹在鸡蛋上,白色的鸡蛋就变红了,那叫寿蛋。母亲说,生日吃了鸡蛋,一年都顺当,叽里咕咕就过来了。于是我拿着那红红的寿蛋,手里还举着山丹花,满山跑着——那少年的生日,怎么说都是与诗意分不开的。

而今,那个拿着红红的寿蛋、举着红红的山丹花的少年,就那么骨骨碌碌走过来了——一晃荡,我都在这个世界上过了五十多个端午节了。回眸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总难免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但我把每一个端午节都看成是等着迎接我的诗意的节日,看成一首浓郁的田园诗。我从少年时便喜欢写诗,一直不弃诗笔。即便过了五十岁,我还一连出版了三本诗集。上天和父母赐给我端午节这个生日,我要把人生当做一首诗来写。端午节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这节日不但充满诗意,也洋溢着暖意。回顾我度过的每



诗意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那年,姐姐给我们编织了五彩线,让我们戴在手腕上,以保一年平安。我在感叹这五彩线拴不住时光的流逝,我们都在无奈地走向天堂的时候,也同时提醒自己,更应该珍惜这每一个端午节,每一个端午节的诗意。只要心存一缕诗意,一切都将变得美好。

那个端午节,儿媳还没过门,就拎着生日蛋糕,还有两箱子书、一幅国画,和儿子一起给我过生日来了——我知道,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奶油蛋糕的香味,还有生活的诗味;那红蜡烛释放出的不光是光与热,还有不断绽放的诗意人生。

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充满诗意的。大诗人屈原的人生是诗意的人生,他虽死犹生,生前身后都是诗,连如今法定的端午节小长假,都是和屈原连在一起的。他沉江几千年,那龙舟为他划了几千年;人们为他包的粽子飘香了几千年,他的诗在人间流芳了几千年。我们不能和屈原比,我们不是诗人,是凡人,可凡人的人生不也同样是有诗意的吗?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总是感叹人生的短暂,过了一岁少一岁。我们不妨坚定地认为,人是从来世的,既然有来世,那真正的生命就是没有终结的,就是一道延续不断的长诗;今生今世写不完的诗,下世还可以写。假如我们来世托生不成人,就算变成了一棵草、艾草;变成了一朵花,山丹,不也还能作为端午节增添几分诗意吗?如此想来,这端午节就永远是诗意的端午了。

院子里的山丹花又要绽放了,那沉甸甸的蓓蕾,多像一支支饱含真情的诗笔呀!

心香一瓣